

非此即彼还是既此且彼的演变进路？

黄宗智

Either/Or or Both/And Paths of Change?

Philip C. C. Huang

摘要：中英文展示了十分不同的基本思维。英文比较强烈倾向非此即彼，中文则较多倾向既此且彼。如此的差别可以见于双方长期以来的不同，甚至可见于中文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使用和理解。展望未来，我们可以预期看到中文和中国的思维在这些方面的更强烈和明显的基本倾向。

Abstract: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evinc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modes of thought and expression. One leans strongly toward either/or, the other both/and. This can be seen 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even in the Chinese understandings and usages of the terms “Communism” and “Communist Party.” Looking to the future, we can expect even stronger and more apparent evidence of the fundamental tendenc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mode of thought.

关键词：不同思维、不同语境、非此即彼、既此且彼、共产党和共产主义

Keywords: different modes of thought, different modes of linguistic context, either/or, both/and, Communist Party and Communism

笔者幼年，直到小学毕业，教育和思维基本完全是以中文为主的，英文仅是外语，但上了中学之后，便逐渐转向以英文为主，大学和研究生毕业期间，以及在美国大学就职之后到 63 岁退休期间，则更是完全以英文为主，使其成为了自己的“右手”。虽然，由于专业是中国历史，研究工作一直必须使用相当数量的中文文献和阅读大量的中文学术著作，但中文可以说基本是自己的左手而非右手。直到退休之后，在国内教学二十年，并从主要用英文写作转入基本仅用中文写作，才再次返回以中文为主的状态。最终进入了一种相对平稳的不分左右的双手并用的状态。

也就是说，笔者亲身经历了三种不同的状态：先是中文为主的人生最初十年，而后是以英文为主的人生五十三年，最后则是再次以中文为主的二十年。在最后的阶段，可以说才完全进入了真正“双语”的状态。最实在的体现也许是，在自己一辈子最主要的十三本专著中，前五本的原作是英文的，后面的八本则全是中文的，乃是 63 岁从加大（洛杉矶校区）退休之后的二十年中用近乎全部时间从事学术写作的成果。

本文对双语和双重文化、区别于单语和单一文化的状态，所提出的一些意见的主要依据是笔者自身的切身经验，不是得自研究或推理而来的看法。其局限是缺乏客观的、乃至量化的依据，其优点则在亲身的体验和认识。

两种不同传统的基本思维

也许，笔者进入双语写作之后的最重要体会，乃是中英文根本思维习惯上的不同。英语比较偏重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并且强烈倾向要求逻辑上的前后一贯，一般不太看好既此且彼的二元互动合一思维，将后者认作一种不够精准清晰、违反逻辑的思维。但中文则相反，比较自然地倾向既此且彼的二元互动合一思维，认为偏向非此即彼的话，会偏重真实的单一面，缺乏整体认识。两者间的根本差别在英语文化偏重逻辑上的单一整合性，而中文则更倾向阴阳、乾坤二元的互动合一思维，与演绎逻辑的要求有一定的不同。

上述两种思维之间的差异是未经明言的，相互间对于对方抱有一种潜意识的拒绝，多于明确的选择。我们较少会看到清晰简白地直面、挑明两种思维的不同论析。更多见的是，两种不同语境分别将自己的特色认作理所当然，一般不会加以说明或论证。结果多是要么将自身的“逻辑”强加于对方，简单忽视、无视或完全不了解对方的观点，或将对方的论析简单视作“不符逻辑”或“自我矛盾”，藉此不予以认真考虑。较少见的是，认识到并认真对待对方的不同逻辑。对比两者，指出其间的不同。最少见的是，更据此得出结合、甚或超越两者的新见解。

最常见的实例也许是，简单将对方的见解认作不符逻辑的错误。譬如，将民主与国家威权认作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两极端，甚或简单将国家能力完全归功于民主政治，认为民主，主要是两党或更多的政党的竞争，乃是真正强大国力的唯一前提和根源，排除其他的可能。单一党派的党治，一如独裁的领袖统治，被认作非民主的、不可持续的专制。如

此的思维较广泛见于英美的民主政治思想。它不会区别政党国家（party-state）和专制国家（dictatorial state），而会将两者共同认作非民主的专制。

更有进者，近现代英语的基本思路乃是与以上的民主思维基本相符的。民主相对专制（democracy vs. autocracy），民主相对集权（democratic vs. authoritarian），乃至民主相对极权（democracy vs. totalitarianism）乃是英语惯常使用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用词，其含义比较普遍被认作理所当然、显而易见，毋庸解释、啰嗦。在这些方面，和中文（在中国国外的高度英语化中文除外）十分不同。

但在中国国内，以上那些“给定前提”乃是相对罕见的。在中国大陆的汉语语境中，以上的那些在中国国外的中文著作中被认作“前提性认识”乃是比较罕见的、意外的，乃至从西方“引进”的，须要认真分析和解剖。较普遍的认识乃是，将“民主”认作一种源自西方英美国家英语的思维，不是理所当然，无需说明、解释和论证的认识，与中文语境十分不同。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基本没有“民主”的概括或理念。对“民主”最接近的乃是孟子中的“民本”思想（“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不是“民主”相对“君主”的近现代西方民主思想。后者源自西方而不是中国。在“民本”的思维中，“民”与“君主”从来不是基于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不是像近现代英语中的“民主”（democracy）相对“君主制”（monarchy）、“专制”（autocracy）那样。

至于现代汉语，它仍然和西方的 democracy vs. autocracy 的二元对立建构有一定的不同。如今，英语的“democracy”一词已经成为与两党（two party）或多党政治（multi-party politics）近乎一致的含义，基本拒绝单一党政治民主的可能——“人民”和民主已被基本等同于多党政治，而（中国大陆的）中文则截然不同，认为一党统治和“民主”绝对不矛盾，认为单一代表全民的政党和“民主”两者之间绝对不矛盾或相互排除。

中英语境迄今的根本不同

实际是，如今的（中国大陆）的汉语和现代英语具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绝对不可简单等同。现代英语中的“政党”（political party）一词，已经基本接纳了多党理念，将“政党”（political party）认作仅代表部分人民的用词，基本拒绝任何单一个“党”便能

够代表全人民的想法。“政党”（political party）一词本身便包含有无可置疑的、仅代表部分人民（即便占到不止一半）的基本性质。毋庸说，其隐含逻辑乃是一种两党乃至多党政治的常态。但当代中国汉语不同，它虽然接纳多党的基本原则，但绝对不排除单一党——即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可能。这就和英语用词（political party）十分不同。

更有进者，如今的英语政党（political party）恰恰排除了占到压倒性统治地位的单一政党，认为这是与真正意义的民主政党统治制度不相符的、矛盾的。而中国的政党用词，则从来没有排除这种可能，甚至是自始便创建于单一党常治的客观实际之上的。前者会拒绝中国目前关于“政党”一词的用法和含义，认为，在单一党统治的实际下，根本就不存在英语中真正的政党。中国则不然，既坚决倡议单一的共产党的长期统治地位，又坚决保留多党的共存。

这就造成如今的中英语境中的一些根本不同。其基本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在名义上既接纳了英美的多党政治建构，又坚决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领导、统治地位。在英语语境中，这是自我矛盾的。固然，如果中国共产党真能长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话，而不陷于仅仅代表任何单一少数群体的利益的话，其理念可以说与实际并不相悖或矛盾。

中文的既此且彼基本思维

在深一层面上，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目前的自我理解。它的自我认识和基本出发点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乃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它和西方的一般意义的政党，譬如，英国的“劳动党”（Labour Party），或“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所代表的仅是部分人民的利益的不同之处。

更深一层的是，中国/中文所包含的思维和西方的有基本的不同。西方习惯凭借演绎逻辑来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而中国则更习惯性地使用（那怕仅是隐含的）既此且彼的二元互动逻辑，譬如乾坤与阴阳，较少见英语中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建构。

从二元互动合一的基本思维出发，当然会得出迥异于西方非此即彼思维的认识，不会像西方近现代思想那样，得出众多非此即彼的概念，如“民主”（democracy）相对“君主”

(monarchy), “进步”(progressive) 相对 “保守”(conservative), 乃至政党 (political party) 相对国家 (nation-state) 的建构, 更可能得出政党国家 (party-state) 或国家政党 (state-party) 的建构。

正是通过认识西方非此即彼的与中国既此且彼的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 我们才能更精准地掌握中国近现代在这方面与西方的一系列根本不同。说到底, 近现代中国, 即便是通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落后于西方和丧失相当部分国家主权的打击, 包括对自身和中国传统的深层反思, 一直都没有完全放弃中国历来的一些根本性思维倾向——即, 面对二元对立, 不会作出简单的全盘引进西方思想, 包括其非此即彼选择惯习, 而更会倾向于长期以来的一种既此且彼的思维, 即便是涉及根本性的改革的思维也如此。

据此, 我们才能认识到, 即便是近现代中国, 一直都没有 (像近现代日本那样), 先是几乎完全接纳 “全盘西化” 的近现代化进路, 而后则像之前的日本军国主义那样, 走上了不可持续的全盘反西化极端; 再其后, 则再次走上了一种全盘西化的道路。而是, 一直都有意无意地保留着中国传统原有的一些根本性认识和思维倾向, 一直都在试图有选择地结合传统与现代, 中国与西方现代。过去如此, 如今仍然如此。

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客观情况下, 面对日本的日益强盛和中国的相对日益衰弱, 人们也许会得出与今天很不一样的结论——认为日本的全盘西化要远优于中国的复杂不清、二元混合与停滞不前。但如今, 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历史, 即便是极端反共的人士们, 也许也能够认识到, 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来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做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所期望看到的两个主要成绩: 即强大的国家能力和自尊, 和绝大多数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

共产党和共产主义?

固然, 有的人仍然会问, 中国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和 “共产主义” 的道路, 那是比较极端的、反对英美自由民主主义的道路, 说不上什么中庸的, 既此且彼的非极端的道路。我们该怎样来认识这个实际?

其基本起源在于国共的长期斗争。国民党在蒋介石领导下, 即便并不真正倡议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 但自始便强烈倾向英美; 共产党则既由于其共产主义思想也由于给定实

际，可以说别无选择地倾向苏联——虽然，众所周知，后来仍然难以避免为了独立自主而到 1960 年便已和苏联基本决裂。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所做出的一系列历史抉择，从来便不简单完全取决于其选择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取决于诸多其他因素，尤其关键的是，坚决要求独立自主，而不是臣服于任何别的国家的势力。

也许，说到底中国近百年经历代表的正是一种既是中国传统也是现代西方的、既此且彼的二元互动合一发展道路，与日本所尝试的要么极端反西、要么极端西化的反复截然不同。也许，中国近现代所展示的相对中西方对立矛盾实际的道路，说到底乃是一种比较“中国特色”的既此且彼的、既是共产主义的也是中国式的、既是强调以人民为主的，也是强调以中国国家为主体的道路。与日本近现代历史中的相对一度要么全盘模仿、要么全盘拒绝西方，而后再次全盘模仿西方的相对极端反复波动截然不同。

返回起点和展望未来

如今，在中国已经做到相对稳定和强大的国力实际下，我们也许可以预期，中国共产党未来将会作出更加独特的和新颖的抉择，其最终状态仍然是个未知之数。在充分独立和自尊的国力基础上，中国兴许将会进一步推进其独立自主，选择性地结合中西的道路，甚至于试图选择性地超越中西对立，进入一种既中亦西的融合性或超越性进路，而非简单的中国传统或现代西方二元的对立。譬如，既是民主的也是非西方的，既是“共产主义的”也是“中国特色的”，既是中国的也是西方的某种超越性综合进路。

可以预期的是，其指导性思路将不会是简单的非中既西，非此即彼的进路，而是复杂得多的既中亦西，融合交汇的新综合体。其具体组成和特点尚是个未知之数，但它多半将是一种迄今尚未见过、尚不可确定的新综合体。它不会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将会是亦此且彼，不会是简单的中国传统或西方现代，而将会是一种新型的，乃至超越性的结合。